

仆从形象的意义分析

——以《伪君子》桃丽娜形象为例

陈思宇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文基班) 210023

摘要:本文以《伪君子》中的仆人桃丽娜为例,分别从文本维度的仆人形象特征以及其带来的戏剧效果分析,身份维度的仆人角色的意义,以及政治维度的仆人形象的政治内蕴,这三个维度分析莫里哀塑造的仆人形象的丰富性。结合法国社会背景,时代特征以及莫里哀戏剧创作思想理念的来源,作为阐释仆人形象的背景依据,增强文章的历史可靠性。三个层次由浅入深,由表层的文本依据到内里的政治隐喻,观察莫里哀在配角塑造上所花笔墨之丰富,剖析这类形象的深刻性。

关键词:《伪君子》;莫里哀;仆人;身份意义

莫里哀作为“现代戏剧之父”,虽遵循着古典主义“三一律”的创作传统,但他也打破了欧洲戏剧表演流于滑稽形式,肤浅言论的惯例。在戏剧中他塑造了一系列鲜活的人物,他们性格特征鲜明。他在聚焦于贵族阶级内部矛盾的同时,笔触也延展至在物质和情感归属上游离于上流阶层家庭但附属这个家庭生存的仆人阶层。正因仆人身位的特殊性,在作品中莫里哀可以变换另一种视角来看待这个家庭,清晰地揭开贵族阶层的虚伪面貌,表达其民主平等的思想意识。本文以莫里哀的《伪君子》为例,分析女仆桃丽娜的形象特征及戏剧效果,并从角色本身抽象出仆人的身份意义,他们作为家庭“局外人”能更加明晰上流阶级家庭内部矛盾的原因,并进一步深化,分析仆人形象在十七世纪的政治隐喻。

一、基于文本的仆人形象分析

莫里哀曾被学者如此评价,“像阿里斯托芬那样泼辣,像米南德那样深入世态,专心致志,写出各类喜剧,成为现代喜剧的先驱的,就是莫里哀。”^[1]阿里斯托芬作为古希腊的戏剧家,他的目的是要批判现实社会,他的视域转向普通人,着力书写普通人生活,并寓庄于谐,在嬉笑怒骂之中反讽世事百态。莫里哀沿袭了这一写作风格,《伪君子》中奥尔贡只是富商,并不能成为贵族阶层,因此当号称把持着宗教绝对权威的答尔丢夫到来时,他妄想能通过教会的力量从普通资产阶级跃升为贵族,而作为更低阶层的桃丽娜言辞犀利泼辣,也正是借这个形象之口辛辣地嘲笑了被抬高了地位,供奉为神祇的“伪君子”。莫里哀接续了阿里斯托芬的传统,他们都“专注于呈现人世生活中普通人性与超出人性的精神之间的抵牾”^[2]。

莫里哀并没有局限在先贤的创作准则之中,而是破旧立新。在先前欧洲的剧本创作中一般底层人物只能作为笑料和激发观众观看兴趣的愚蠢形象,严明的阶级性体现在这一文化符号上,这种不成文的规定大大限制了剧本人物的丰富性。而莫里哀却反戈这一传统,让“侯爵成了今天喜剧的小丑”^[3]将底层人物塑造成具有崇高精神和理智思考能力的正常人。

《伪君子》中桃丽娜作为上流家庭中的仆人,被赋予了极高的智慧,她机敏聪慧、清醒洞察力强,与糊涂的主角奥尔贡和伯奈尔夫人形成鲜明的对比。典型场景为第一幕第四场中,桃丽娜向奥尔贡告知夫人欧米尔的病情,奥尔贡却都要顺带问答尔丢夫,并加一句“真怪可怜的!”答尔丢夫的好吃懒做与夫人虚弱形成对比,这种滑稽可笑的情节,加强了反讽的戏剧效果。

主角与仆人同时构成了虚伪和真实的对峙。虚伪在《伪君子》中有两类典型表现,一类是答尔丢夫的伪善,另一类是奥尔贡看似民主实则专制的大家长管理。前者通过灌输宗教信仰,进行精神控制,用冠冕堂皇的陈说麻痹他人,来掩饰肮脏的勾当,达到利益目的。后者则是言语上似乎在宣扬民主,而实际行动则处处流露着专断,他拥有家族的物质权力,通过物质要挟来掌握家庭的绝对控制权。桃丽娜则将他们虚伪的面具毫不留情地一把撕开,她冷嘲答尔丢夫禁欲主义背后对女人热切渴望,热讽奥尔贡的愚蠢,对女儿自由的独断限制。每一次她都是一语中的,直击要害,不留情面。虚伪是用言语层层粉饰,拐弯抹角意图藏住卑劣,而真实却坦诚直白,正大光明,犀利嘲讽。

身份地位和道德水平的错位实则暗含了作者对上流阶级的反叛意识。在崇拜上流阶层,将贵族言行奉为圭臬的社会之中,贵族阶级高人一等的观念固化在思想意识形态之中。但莫里哀却揭示了以答尔丢夫为代表的“伪”贵族阶级的道貌岸然,以奥尔贡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的愚钝蠢笨。奴仆桃丽娜在道德层面完全压制了代表上流阶层的两类人,莫里哀用身份与品德的不对等,揭露了高贵身份背后人性的顽劣卑鄙。这也就是当时莫里哀的《伪君子》被教会和贵族反对,多次禁演的原因之一。它触动了贵族阶级敏感的神经和痛处,他们不愿意赤裸裸面对自己的真实人性,意图掩盖事实,不允许错位的产生。

莫里哀的笔触包罗了社会各个阶层,他从不忽视书写普通人,重新构建起戏剧中仆人的形象,不再单调地漫画底层

人物,通过身份和道德的错位颠覆社会固化却已畸形的认知,传达出他的民主倾向。

二、仆人“局外人”身份的特殊意义

仆人实际是一个家庭的边缘人,或说是被家庭所排外的“局外人”。他们在家庭关系中被排除在亲缘利益网之外,因没有亲缘关系,则没有情感纠缠的和财产归属的冲突,在这两个方面,可以说仆人与上流阶层的家庭是疏离的。在《伪君子》中,玛丽亚娜对奥尔贡的妥协,与桃丽娜的绝对批判相比,则显得优柔寡断,畏惧退缩,甚至希冀通过卑躬屈膝地祈求,能让奥尔贡放过自己。这种反抗的暧昧态度,其实满足了奥尔贡作为家庭绝对权威存在,对下实行压迫的欲望,变相膨胀了奥尔贡内心的虚荣感。而达米斯想要揭露答尔丢夫,原因仅仅是因为答尔丢夫擅自“作威作福”,让他失去了自由,他的目的实则也并不高尚,是为了自我利益(财产继承)不被抢夺。这种急迫的跳脚行为,也是父权强大权威之下的争宠心理作祟,更甚,可以说是对权威的一种献媚。而奥尔贡想让答尔丢夫成为家庭的女婿也是有利己目的的,他将答尔丢夫拉入亲缘网,让他认为所谓的“贵族血液”流入,通过加强情感连接性,产生利益共同体,拉近自我家族与贵族的距离。而仆人因为身份的底层性,不会为这个家庭中的复杂关系所羁绊,也不容易被家庭的管理模式所威胁到,能够更加自如地旁观这个家庭。

虽然情感与利益关系疏离,但是因为与家族内部的人朝夕相处,对家庭中人的个性是熟悉的。因此,仆人往往会用更为纯粹而理性的眼光从外部审视人物的内心,洞察出个人的缺点和私欲。她首先揭穿答尔丢夫的虚假,看穿了玛丽亚娜的懦弱和无奈,试图凭借自己的口舌和克雷央特的力量挽救玛丽亚娜的婚姻,又洞悉达米斯鲁莽的本质,预料了他揭穿答尔丢夫行径的必然失败。但也因为她是这个家庭的边缘人物,身份过于低微,她并没有实际的话语权,人微言轻,她没有能力去扭转局面。这也表现出等级严明的统治下,底层人民迫于地位而丧失民主,不被重视的无奈生存状态。

因仆人这个身份的普通,他们的想法是普罗大众想法的缩影,他们代表着正常人,即他们是用社会中正常人的眼光,审视了上流阶层。这突出了上流阶层某些行为脱离了群众理解,而显得匪夷所思和荒诞十足。在桃丽娜眼中,奥尔贡狂热崇拜答尔丢夫的行为尤其可笑,而答尔丢夫的一切掩饰都显得苍白和幼稚。

仆人作为“局外人”,不参杂在上流阶层的社会关系网中,他们的言论可以更加犀利,更能代表作者实际的立场。参杂在家族网中的人物即使是正面的,但由于本身属于上流阶层,他们的身份性限制了作者批判性叙述的广度,作者不能将对贵族阶层、对上流阶层的讽刺直接从这些人物的口中说出,这就限制了对某一“类”群体的总体批判,而只能反驳个体,对抗个体行为,也就导致了讽刺对象单一,批

判不够充分,也不具有普遍意义。而让女仆桃丽娜存在,作者可以借桃丽娜之口,直接诉说自己最真实的想法,不会显得突兀,比如在第一幕第二场中他说奥尔贡“简直是一个傻子”,答尔丢夫“用虚伪的虔诚时时刻刻骗到钱财”,第二幕第二场说“虚荣心和敬主的热忱合不到一起”,第三场中面对玛丽亚娜的几近屈服,冷嘲到“您的命运太好了,还有什么可抱怨的!”“这都体现了桃丽娜的理智和清醒。作者通过这样叙述,凸显了小人物的智慧,又让桃丽娜拥有了看似全知的视角,让同样作为全知者的普通读者或者戏剧欣赏者容易产生共鸣。

仆人身份的特殊性使叙述变得便捷,因“局外人”的身份,能够开启另一种视角叙述上流阶层家庭内部的矛盾冲突,直接揭示作者的思想。在情节发展上,能同时充当情节的推动剂和缓冲剂,适时地调整矛盾焦点,让故事发展张弛有度。

三、仆人的政治含蕴

仆人的声音其实也是作者的声音,而若将政治的意识形态立场介入到文本之中,那么清醒、理性的仆人代表的是如作者一样的政治边缘人——不在政治漩涡的中心,但通过某种方式间接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

戏剧被赋予政治意味可以溯源到底希斯特拉图时期,底希斯特拉图通过设立狄俄尼索斯戏剧节,将戏剧由民间演出的形式合法化,使之成为城邦官方表演形式,在戏剧中渗透政治思想,艺术形式已然和意识形态捆绑在一起。而柏拉图时期的谐剧中则将戏剧的地位抬高,代表着艺术领域的最高表现形式,与法律创制构成双足鼎立和相辅相成的关系,“戏剧制作与法律创制同属人世中最高级的制作,前者为灵魂秩序立法,后者为政治秩序立法”^[4]。到了十七世纪,法国正处于国家政治转型期,戏剧成为了潜移默化影响民众思想的重要工具。

莫里哀作为剧作家,并不直接参与到政治纠纷和权力争夺之中,因此并不会引发贵族的直接攻击。但因戏剧的政治隐喻性,他可以以现实作影子,勾勒出内心的政治想法。而当时王室路易十四对戏剧极为推崇,希望通过戏剧反映王室与教会主教争夺统治权的意图,“清除宗教改革带来的教派分离”^[5]。莫里哀抓住了王室的审美取向,依靠国王的支持,他能够深入了解到王室与教会纠纷的秘辛,为其创作带来了便利。而莫里哀又是从民间发迹,知晓普通人的生活与思想状况,同时兼备剧作家和普通民众两重身份,去观察宗教狂热现象和民主启蒙思潮,去叙述故事,身份的多样性让其作品含韵丰富。以《伪君子》为例,虽然以今天的观点来看,国王的突然降临,拯救处于水深火热中的奥尔贡一家,这个情节显得突兀而不和常理,但正隐喻了教会与王室的对抗,而王室代表正义,最终会取得胜利的政治立场,以及民众开始将信仰重心从宗教逐渐转移向国王,民意在新统治下逐渐倾斜的社会现状。

有学者研究《伪君子》中的小人物，称克莱昂特为“哲人形象”，而桃丽娜则是“人民的代言人”。那么“仆人”不仅代表的以莫里哀为代表的边缘化的“社会公仆”——政治发声者，“仆人”的声音也可以代表了普通民众的呼声。普通民众并不是都被宗教信仰所蒙昧，他们对贵族阶层的虚伪和装腔作势的做派心知肚明，但却得忍受着贵族以善的名义、以上帝的名义对他们进行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双重摧残。他们不敢说出口的话，由莫里哀借桃丽娜口说出，这是民众的呐喊，也是微薄的反抗力量。民众不愿成为教会案板下屠宰的羔羊，通过桃丽娜大胆的反叛发声，他们在传达着一个愿望——要逃出宗教精神的桎梏，呼吁自我独立人格的回归，成为真正具有智慧和理性的完整的人，这和法国的启蒙思想滥觞的时代特征相契合。

若将仆人看作配角而忽视，或是仅仅将其当作了凸显否定性主角的“丑”的对照物，那么就将作者的深意浅显化了。莫里哀塑造答尔丢夫为宗教骗子，是将矛头直指教会和贵族，暗讽中是明嘲。而桃丽娜的形象意蕴则更加隐晦，她作为上流阶层家庭的边缘人的身份，象征着作者是政治边缘人，她亦是普通民众的政治代表，表达了民众热切输出独立思想的愿望和干预政治决策的愿望。也因隐晦，桃丽娜的形象与答尔丢夫相较就更为丰满，让读者有更多代入感，有更多想象的空间。

四、小结

基于文本，莫里哀笔下的桃丽娜勇敢正直，理性机敏，这个绝对正面形象的出现与反面主角形成强烈对比，从而让整部戏剧冲突性增强，值得玩味，这个形象中也寓含了作者对贵族阶级虚伪做作的极度厌恶和冷嘲热讽的情感。而从文本引申到桃丽娜身份的特殊性——仆人，她属于但又不完全

属于这个家庭，笔者分析了他们拥有敏锐洞察力的原因所在，这种家庭边缘身份给予了仆人表达思想的便利性。最后笔者阐释了仆人不单单是某个形象，也是象征体，他们具有双重象征性，象征了转型期法国社会的两类人，一类是以作者为代表的方便叙述政治而又不参与政治的边缘人，一类是借这个形象终于得到发声的普通民众，仆人的形象也因此拥有了丰富的政治内涵。

莫里哀并没有受“三一律”的限制，简单将配角人物塑造造成仅仅只能推动情节发展的行动元，他笔下的每个形象都有深意，他将自我的力量投注到角色上，他的声音与角色的声音形成共振，发出爆鸣。从贵族到仆人，他详尽挖掘了每个阶层人物在当时社会环境中的心理动态，并透过角色表达自我的民主思想，不愧为时代的先声。

参考文献：

- [1] 李健吾，李健吾戏剧评论选[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2；第82页
- [2] 贺方婴，《莫里哀的“伪君子”与卢梭式的启蒙——近代法国两次国家转型时期的诗学问题》，国外文学，2018（04），第138页
- [3] 胡健生，莫里哀喜剧艺术风格：悲喜交错乎？[J]，国外社会科学，1988，（3），第45页
- [4] 贺方婴，《莫里哀的“伪君子”与卢梭式的启蒙——近代法国两次国家转型时期的诗学问题》，国外文学，2018（04），第138页
- [5] 贺方婴，《莫里哀的“伪君子”与卢梭式的启蒙——近代法国两次国家转型时期的诗学问题》，国外文学，2018（04），第138页

